

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的师朝明和王在祯，是“日本劳工”这段历史的见证人。他们在年轻时被掳到日本，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，但当年那段残酷的记忆，依然深刻在他们脑海中。“我要活着等到日本人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。”

“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”

当年的“日本劳工”难忘残酷记忆，饿极了草纸充饥，回国时带着工友骨灰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小蒙



师朝明老人平时并不常给孩子讲当年的事，在他生日时孩子才知道一些细节。

口述人：师朝明，蛮子村人，91岁

18岁被抓到日本 每天干活吃不饱

说真的，要不是身边人一直问我当年的事，我可能都不愿记起来了。

我家原来在济宁梁山，在我12岁那年，有一次发大水把家里的地都给淹了。眼看老家实在没什么吃的，我娘就带着我们一路讨饭来到了济南，投奔在济南打工的舅舅。

我有个小名叫“朱来子”，家里兄弟姐妹四个。后来我娘跟了蛮子村一户人家，就起了个名叫李俊福。记不清去日本时是用哪个名了，但“师朝明”是我回国后才改回来的。

那是在1943年10月份，我和同庄的几个小伙子，记不得是在街上玩还是在地里干活了，日本鬼子连哄带骗地把我们抓走了。当时一起被抓走的，还有邵东村、邵而庄的几个人。

后来，我们被关在当时的七贤庄，又转到济南“新华苑”，被关在一起的有好几百人。有像我一样的小伙子，还有五六十岁的。我们被绳子绑着，先是坐了闷罐车（火车）到海

边，接着又坐船漂了十几天。

到了日本啥地方，因为听不懂当地的话，一直也不清楚。就记得干活的地方四面都是山，每天就是下矿干活，推着轱辘马（小推车）装车。直到回来后，才知道我一直在北海道的三菱公司干活。

挖矿是个重体力活，可一天下来就只给吃面疙瘩、稀饭和一小条卷子，根本吃不饱，不少人就去吃地上的雪。每天从睁眼干到天黑，半死不活。

双腿受寒无法弯曲 回来带着工友骨灰

当时被抓走穿得不是很厚，日本下了很大的雪，不少人都冻坏了。在那边也不给发衣服，不论春夏秋冬的，就穿自己这一身，只给发了一双夹趾鞋。没有衣服，不少工友就把麻袋片、树皮绑在身上防寒。

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一个小矿，每天睁开眼就有人领着我们下矿。我们十几个人挤住在一间木头屋里，除了睡觉，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黑黑的井下干活。在那我也没了名字，只

有鬼子给编的号。因为水土不服，再加上条件恶劣，不少工友都生了病。但日本鬼子根本不让休息，鬼子的监工时刻盯着我们上工，稍微偷懒就会挨打。在那里，不少工友相继饿死、病死，鬼子就把尸体拉走随便找地方埋了。那时想跑都跑不出去，四面都是山，又听不懂当地人说话，连点吃的也没有。一直到1945年8月听说日本投降，我们才可以回家了。在日本上船后先是到了塘沽，又坐火车到了天津。

当时我们在同一个矿上邻村的五个人，一起从天津跑了300公里才回来。见了家里人高兴得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就只会抱在一起哭。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，加上找不到我她心里着急，我回来没多久她就病死了。

在回国的时候，不少人还带回了工友的骨灰，就想着怎么也不能把他们留在日本。真没想到的是，我也能活着回来。但因为长期劳累伤了身体，膝盖也受了寒，膝盖一直弯不下，解大便都得站着。在生产队里干活拔萝卜，都只能撅着屁股，根本蹲不下去。

口述人：张文华，父亲张振海与师朝明一起被抓到日本

让拿锤子摸了蛤蟆 挨了一顿暴揍

身边人一直说我父亲曾经去过日本，但我却没听父亲提起过。有一次我向父亲求证这件事，他总说：“问

这干吗怪伤心的，吃了那么多苦。”不过，有一次父亲还是跟我讲了一点他在日本的经历。

父亲22岁那年被抓到了日本，但听不懂当地人的话。有个日本鬼子让他去拿锤子，日语发音是

“蛤蟆”，父亲心想这会儿往哪儿找去，但还是跳到了水里去摸蛤蟆。日本人这时急了说“八嘎”，父亲听成了“八个”心里就犯起了嘀咕，“一个还摸不着呢。”等父亲上岸以后，被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
口述人：王庆梅，章丘水寨镇张家林村人，父亲王在祯19岁时被抓到日本

父亲常跟我讲起他当年的那段经历，他说最大的梦想就是活着，一直等到日本人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。不过现在他身体越来越不好，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八兄弟也就剩下他还在了。

19岁时抗日 在北辛寨被围

我家在章丘市水寨镇张家林村，父亲19岁时是当地的一名抗日队员。1944年4月，他与战友和当地老百姓，在张家林村附近的北辛寨被日军团团围住，被困的还有几百人。他们奋起反抗，但还是没有冲出包围，不少人被打死，还有一些受了伤。

他们被抓了以后，就被押往淄博周村，接着又坐闷罐车到了济南“新华苑”。在去济南的路上，有十几个冲破了铁丝拴住的火车门跳下了车。这些人大都已成家，有的跌进了沟里，有的碰到了石头上摔得头破血流的，有的没活成。

父亲他们被关在新华苑待了两个多月，看着每天都有人死去。有的是被打死的，有的是受伤后得不到医治病死的。随后他们被押上船运到了九州岛，在日铁鹿町煤矿挖煤炭。

我奶奶始终不知道父亲死活，痛苦得不得了。过了一年听说隔壁村有个被掳到日本的劳工被打死了，还以为我父亲也活不成了。

在那挖煤实行两班倒，父亲每天要下矿挖12小时的煤，基本上除了睡觉就是干活。天天有人盯着，干活慢了、走路慢了都有可能被打，日本人有时还会捡起地上的土块砸过来，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。有一次矿井掉下一块石头刚好砸中了他脚踝，过了很长时间才痊愈。

饿了拿草纸填肚 为赚吃的去抬尸

父亲说，在那干活没吃过一顿饱饭。每天三顿饭，只给3个两寸大小的馒头，那么大的馒头其实吃五六个人吃不饱的。饿着肚子的大家，看见能吃的东西就抢，路边有人扔的萝卜头、橘子皮都是好的。在那生了病也没有人理睬，照常干活不说，吃的还要减半。

他说，那时饿疯了还吃过草纸。为了多赚点吃的，父亲还干过抬尸的活。每天工地上都有不少人饿死，累死或病死，一年时间，他们那一批劳工饿死了40人。父亲抬着这些尸体扔到个地方，能多换一个小馒头。

父亲曾认识一个日本姑娘，那个姑娘经常来捡煤渣。

父亲教她中文，姑娘教她日文，偶尔会把吃剩下的饭菜拿一点给父亲。父亲一直试图打听自己在日本哪个地方，可苦于无人理睬，也没有问出来。

其实父亲也不是没动过逃跑的念头。但那时逃跑的人只要被抓回来，都会立刻被打死。直到1945年8月，父亲所在的煤矿才告诉他可以回家了。从日本坐上船后，仅一天就回到了塘沽，又坐火车到了天津。父亲拿到了两块钱，从天津走回了济南。

回家心切的父亲，一天走百余里路，六天后回到济南，到了家与奶奶他们抱头痛哭。父亲在日本时从不敢想自己的将来，幸运的话可能在日本终老，不幸的话就像工友一朝被折磨致死。他从没想过朝一日还会回到自己的国家。

最大的心愿是 看到日本人道歉

父亲回国后参加了革命，在章丘、邹平一带跟国民党拉锯战，好几次差点丢命，有一次子弹还擦着他的右眼角飞过去，还好没有伤及性命。打从我记事开始，父亲就时常给我讲这些当年的事。

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遗憾，就是当年没能参加刘连仁的发布会。那时北海道野人刘连仁起诉日方胜利，曾给我父亲发出邀请让他来参加。但家里太穷了，最终也没有去成。我知道他很想去看别人讨回公道，也盼着自己有一天能讨回公道。

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活着，瞪着眼珠子盼着日本人给道歉，并拿到应有的补偿。当年父亲跟同时被掳去的邻村七个人拜了兄弟，想着万一能有回来的，就往各家捎个信。这几年他这些兄弟相继过世，就剩父亲还在坚持着。

在日本干的那两年，毁了父亲的身体，腰落下了毛病，他一直干不了重体力活。现在穿衣服都费劲的他，去年刚治好了肺炎，今年心脏又有了问题。父亲说恨日本鬼子，但也知道恨解决不了问题。他想着在世的劳工没有多少，只要他活着就是活证据。

这么多年来，年老的父亲没有拿到任何补贴和补偿，说起这事，他总是偷偷抹眼泪。

